

浙江省现代作家地理分布及走向研究

池若飞

【摘要】浙江省现代文学家群体的异军突起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作家的创作价值评估，或某一地区作家群体的创作钩沉，整体性的研究仍付之阙如。本文拟利用时下兴起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对浙江省现代作家的地理分布、走向特点及原因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对地域文化与作家创作的深层互动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浙江省 作家 地理分布 走向

【作者】池若飞，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讲师。（绍兴 312000）

文学家地理学的研究在本世纪初渐成“显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随着地理意识和空间意识的增强，学者们积极寻找文学地理学研究新的生长点。其中，梅新林、夏汉宁、曾大兴等运用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学家地理分布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探讨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文学家、文学作品相渗透、影响的交互关系，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①从中国古代地理形态变化与著名文学家地域分布及流向的关系，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体系。夏汉宁以《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②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地域分布进行了详尽的考录和归纳，考察出宋代江西聚居各地的文学家族在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崛起和壮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曾大兴的研究更为深入，他的研究兼具微观与宏观视角，即有广东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及特点研究、岭南气候与物候对作家生命意识与艺术风格影响等实证研究，又孜孜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试图建立起与文学史学并峙的文学地理学。^③在他们的推动下，学者们纷纷从实证研究和理论体系构建两个方面将文学地理学研究向纵深推进，使得这一领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相形之下，现代文学的相关研究仍然付之阙如。究其因，古代社会发展缓慢、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小，各地区在自然风貌、人文景观、民情风俗等方面相对封闭和独立，因此区域间的差异明显，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学家及作品的交互关系颇具说服力。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变化相对剧烈。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逐渐建立，使得人口的流动前所未有地自由和迅速，因此，不同地区的发展变化越来越趋于同质化。尽管如此，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条缓慢流动的河流，优秀的作家们纷纷以带有显著地域特色的创作自立于文坛，尤其在对其籍某地的某些作家群进行考察时，他们身上体现的集体文化自觉和地域烙印就尤为显著，由此，浙江籍现代作家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现代文学从时间跨度上讲并不长，但这是一个创作异常活跃、名家辈出的时期。而浙江作家占据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其人数之众、成就之大、涉足的文学门类之丰富，非他地作家可比拟，其地缘因素不可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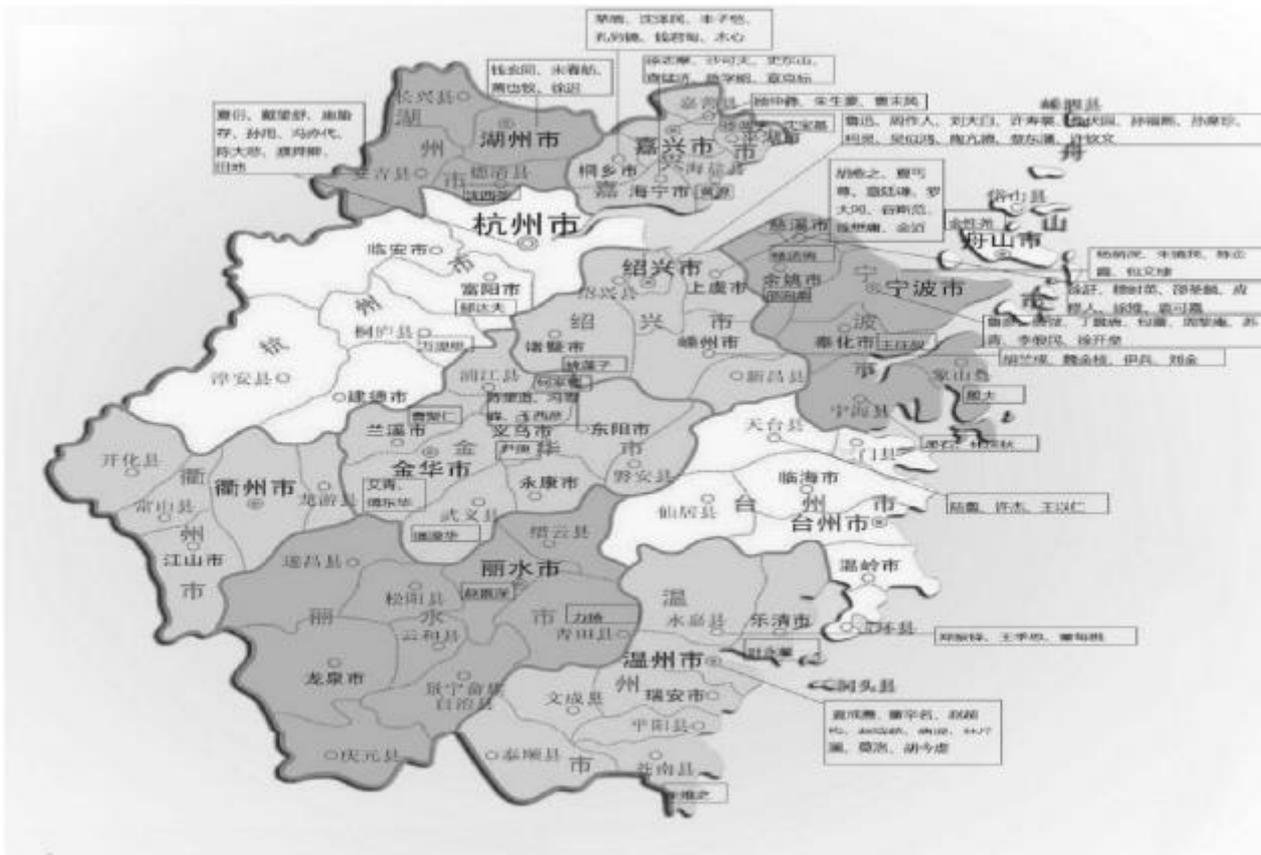
浙江文化和文学的繁荣，由来已久。自唐后期，浙江就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迁都浙江临安，浙江遂成全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明清。至民国通商口岸被开辟，西学东渐，浙江在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上，又开风气之先，成为新文化、新思潮、新式教育的重地。浙江的文化形态既统一又复杂多样，既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有机结合，又是吴越文化的汇集之地，而北人的大量南迁又为其带来了中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浙江地区间的地理形态差异而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使得区域间的文化差异仍较为显著。这些都为研究浙江现代作家的地理分布提供了客观条件。本文初步考察分析浙江省现代作家的地理分布及走向，即“版图复原”研究^④，分析作家繁盛与区域间地理文化差异的深层关系，以期对地域文化与作家创作的深层互动性研究提供参考。

一、浙江现代作家地理分布格局

考察浙江现代作家的地理分布，在作家的选取上主要依据两个标准：一是作家的出生地在浙江；二是作家的教育、成长经历与浙江有着密切的关系。依据这两个标准，本文在作家选取上主要参考陈坚主编的《浙江现代文学百家》^⑥和郑绩的《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⑦。两书是符合上述作家选取条件且收录作家最全面的两本参考书目，此外，对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也作了较为详尽和真实可信的介绍，非常有助于笔者的分析研究。由此，笔者最终选取了109位浙江作家，虽不能说全面的收入了浙江现代作家，但是重要的作家几无遗漏，未收入的在创作的量和质上均相形见绌，影响力和创作价值也委实可忽略不计。

据周祝伟在《论浙江行政区雏形的历史形成》一文观点，浙江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下辖杭州、严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台州、金华、衢州、处州、温州11府，治杭州府，定型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一月。此后，这一行政区划格局历经600余年以迄于今，从未再有大的变更。^⑧因此对作家的地区划分即使参照当今的行政区划规划，也应无重大偏差。

笔者对这109位作家的地理分布作了详细地统计和归类，见图一（此图采用2005年浙江省行政区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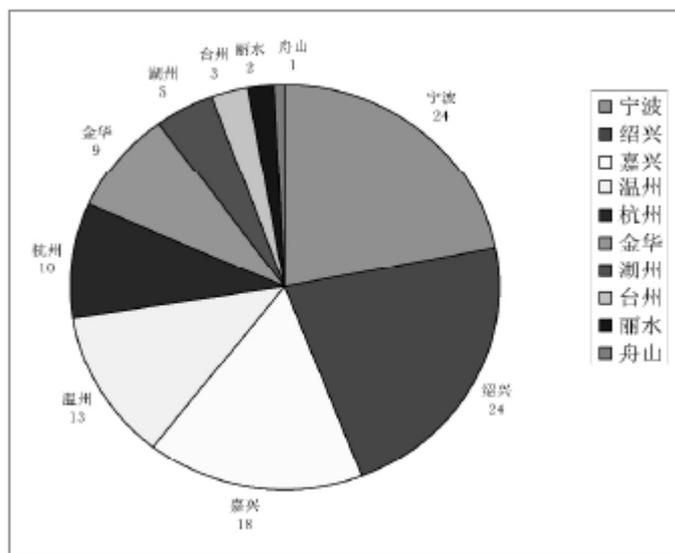


图一

1. 绍兴市24人（其中绍兴县12人、上虞市7人、嵊州市4人、诸暨市1人）。
2. 宁波市24人（其中慈溪市6人、镇海县5人、鄞县4人、宁波市3人、宁海县〔原属于台州〕2人、余姚市2人、奉化市1人、象山县1人）。
3. 嘉兴市18人（其中桐乡市6人、海宁市6人、嘉兴市3人、平湖市2人、海盐县1人）。

4. 温州市13人（其中温州市8人、永嘉县3人、乐清市1人、苍南县1人）。
5. 杭州市10人（其中杭州市8人、富阳市1人、桐庐县1人）。
6. 金华市9人（其中义乌市5人、金华县2人、兰溪市1人、武义县1人）。
7. 湖州市5人（其中吴兴4人、德清县1人）。
8. 台州市3人（其中天台县3人）。
9. 丽水市2人（其中丽水1人、青田县1人）。
10. 舟山市1人（其中定海县1人）。

即下图：



图二

上面两图直观地反映出浙江省现代作家的分布格局，即：1. 作家由沿海、沿边地区向腹地逐渐减少；2. 浙西的嘉兴、杭州，浙东的绍兴、宁波、温州五个地区，是现代作家最为集中的区域，每个地区的作家数量均在10人及其以上，以绍兴和宁波作家数为最，五个地区的总和占全部浙江现代作家的80%之多，且现代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汇集于此。而这五个地区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交通、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区位优势，具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因此也就形成了作家们的渊薮。

二、基于作家地理分布格局的原因分析

浙江现代作家这一分布格局的形成，受历史的、长期的、必然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具体分析重点地区的区位优势形成原因，具有参考意义和价值：

1. 经济因素。自明以来，浙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尤以浙西的杭嘉，浙东的宁绍温地区为胜。杭嘉湖是全国丝织生产与交换的著名地区，宁绍、温黄平原的棉花种植及纺织业又极为发达。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市镇数量的猛增和市镇经济的蓬勃发展，到近代，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初具规模。甲午战争之后通商口岸的开辟，这些区域又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首当其冲之地。当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在上海经济的辐射之下，上述地区的棉纺、缫丝和丝织业、造纸、机器制造、火柴制造以及手工制品、渔业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社会生产力有了更具现代性的提高，城乡商品经济无论在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上都较前有了明显的增长。经济的相对发达、交通的便利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2. 文化因素。南宋定都临安后，浙江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蓬勃发展，人才之盛，位列全国第一。明以后，浙江的文学、史学与哲学发展均极为繁盛，浙西考证学首推嘉兴的朱彝尊；浙东偏重于史学发展，以余姚的黄宗羲为开山，绍兴的章学诚为殿军，而温州自宋以来就是永嘉学派的发源地，大家辈出。由此至近代，深厚的学术底蕴方能生生不息，孕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学术底蕴的深厚可以从绍兴地区现代作家身上一窥究竟：1900年以前生人，或自为秀才、拔贡，如蔡东藩、刘大白；或书香门第、幼读家馆，如胡愈之、夏丏尊等；或父亲为秀才、举人，父亲开蒙，如许寿裳、许钦文等，基本都受过扎实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

3. 教育因素。经济的相对繁荣和发达，故浙江能广兴文教，明清之际浙江的地方官学和书院教育就盛极一时。科举废除之后，现代初中级教育也得以尽快地建立和发展。“1913年5月，浙江省议会就通过《筹设省立师范决议案》，规定每一旧府各设立师范学校一所，宁波、绍兴、金华、温州、处州5府所属师范学校一律改为省立，未设师范学校的各府必须在1914年7月1日前设立。”^⑥学费低廉的师范学校成为广大贫家子弟的优先选择。其中，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最为著名，它被列为民国时期国内六大最著名师范学校之一，汇集了夏丏尊、李叔同、刘大白、许寿裳等优秀的教师，以开明学风和优良师资培养了诸如嘉兴的丰子恺、查猛济，台州的柔石、林淡秋，绍兴的魏金枝、金华的冯雪峰、曹聚仁等一批年青作家。此外，经济发达地区如宁波、杭州、嘉兴、绍兴、温州，私立学校的兴办之风也十分兴盛。开明有识的教育家和商人积极开办私立中学，如宁波效实中学、上虞春晖中学、杭州安定中学、绍兴稽山中学等。考察浙江现代作家的教育经历，这些作家几乎都受到了完整的中学教育，受教学校覆盖了公立、私立以及师范、专科院校。相对现代化的课程设置的开放的求学环境客观上推动了浙江启蒙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批具有新的文化思想的青年学子得以迅速成长。

4. 杰出人物的带动和引领。重乡情、讲乡谊虽非浙江人独有的地域文化性格，但是浙江人将其发挥到极致，从明清龙游商帮的全国称雄，到近代宁波商帮的崛起，再到当代温州人的独闯天下，他们始终以抱团取暖、相互扶持的群体姿态闻名于海内外。新文化运动中，以“一刊一校”为阵地集结起来的革新力量，汇聚了大量的浙江学人。在钱玄同、刘半农等的推介之下，《新青年》担任编辑、发表文章的浙江作家几乎占了该刊物同人一半的份额；而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执掌后，中文系也成了浙江学人和作家的汇聚之所，除周氏兄弟外，还有颇具声望的“三沈（沈尹默、沈远士、沈兼士）”和“三马（马裕藻、马衡、马鉴）”。这个现象，甚至被某作家讥讽为“北大的中文系里浙江人专权”^⑦。以乡谊之情带动后辈作家，首推鲁迅。绍兴地区的22作家中，受到鲁迅提携进入文坛的就有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孙席珍、章廷谦、徐懋庸、魏金枝、许钦文7人。孙伏园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就是鲁迅的学生，1918年经周作人介绍，他和弟弟孙福熙兄弟到北京大学旁听，又受教于鲁迅门下。鲁迅到上海定居之前，孙伏园与鲁迅的名字常常联系在一起。章廷谦在孙伏园的引见下与鲁迅建立交往，办《语丝》，在鲁迅的协助下校录《游仙窟》，兄弟失和后甚至代为居中传话。徐懋庸致力于创作“鲁迅风”的杂文，在杂文集出版、左联的工作等方面都受到鲁迅的影响。魏金枝1929年经柔石引见，结识鲁迅，小说《留下镇的黄昏》经鲁迅之手发表，后又被鲁迅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从此以“乡土作家”的文名著于文坛。其他地区的作家也不乏深受鲁迅提携者，宁波的鲁彦成为“乡土文学家”、唐弢专事鲁迅研究，柔石虽然英年早逝，却仍能够以少而精的小说创作在左翼文坛占有一席之地，都与鲁迅的照拂和影响密不可分。除鲁迅之外，夏丏尊在提携后辈上也不遗余力。他发起春晖中学、参创立达学园、开明书店，培育新人，其美术观念影响了丰子恺日后的散文创作，丰子恺又接过老师衣钵，培育和影响了钱君匋等一批青年艺术家。正是一代代浙江作家不遗余力，提携后辈，才使得薪火相传，浙江籍作家在现代文坛日益壮大，成为一支不可被忽视的“浙军”。

5. 本土文学团体的蓬勃发展对青年作家成长和成熟的加速作用。在新文学建设初期，影响最大的几个文学团体，如文学研

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等，几乎均由浙籍作家作家领衔或担纲组建。与此同时，有的本土文学社团也具有了全国影响力，如杭州的晨光文学社和湖畔诗社。前者1921年由潘漠华、汪静之等发起，社员有柔石、魏金枝等，《晨光》文学周刊为社团刊物，主要创作诗歌和散文；后者1922年成立，成员即是当时“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人”：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魏金枝和汪静之。出版《湖畔》、《春的歌集》等诗集，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过重大影响。此外在浙江本土产生影响力的还有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由宁波的省立四中、春晖中学的部分师生组成。其他如杭州的兰社、悟社、荒原社，绍兴的微光社、启明学社，嘉兴的桐乡青年社等，为浙江的新文学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文学氛围，也孕育了新文学创作更多的后备力量。

三、重点区域作家走向分析

以上对浙江作家的分布特点及原因做了整体分析，结合重点地区的作家分布及各自的生平经历，不同地区作家在创作风貌、走向等方面还略有差别，笔者试分析一二：

1. 绍兴地区的作家可大致按照出生年划分为两批：一批在1900年前生，五四时期已经在新文学领域有所成就，如周氏兄弟、刘大白、许寿裳、孙伏园、孙福熙、胡愈之、夏丐尊、许钦文等，与鲁迅的交往也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为文坛作熟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批在1900年以后出生，在创作的多样性和文坛影响力上都逊于前一批，他们中较为成名的多与鲁迅的提携和扶持有关，如章廷谦、徐懋庸等，且文坛走向多选择左倾，成为左翼作家。

2. 相比于绍兴的作家，宁波地区的作家基本都出生于1900年后，从开蒙到初、中级教育都以新式教育为主，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束缚相对较少，思想上也就更加激进和现代。宁波人作为上海开商埠之后进入的一支重要力量，与上海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体现在这些作家身上。他们不论家境或贫或富，总有亲戚或家人在上海经营实业或讨生活，因此大部分在青少年时期即到上海读书或谋生，如殷夫、柔石、应修人等；或大学时期在上海度过，如邵荃麟、王任叔等。上海是他们睁眼看世界，进行人生选择的重要场域。徐訏、穆时英作为“富家公子”，充分体验着上海作为大都市的五光十色，时髦的都市洋派文学是其文学追求；苏青、杨荫深等上海谋生的市井小民，俗文学的创作或研究是其生存之道；唐弢、楼适夷、包文棣、应修人少年辍学，作为普通工人上海谋生，靠勤学多思、自强不息走上文坛的作家，其创作倾向就必然偏左。

3. 嘉兴地区作家的组成和文体风格最为复杂，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青年作家的生活轨迹多与上海有关，但受左翼风潮影响的较少。三位领军式的人物茅盾、丰子恺、徐志摩创作文体和风格各异，对其他嘉兴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作用远不及鲁迅在绍兴作家群中的影响力。茅盾年少时即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谋生，除带动其胞弟和妻弟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其影响力恐怕更在嘉兴作家之外。徐志摩丰子恺1919年考入浙江一师，深受李叔同和夏丐尊的影响，奠定他一生音乐、书画和散文相辅相成的艺术风格。后辈作家钱君匋、黄源均曾为他的学生，钱君匋的艺术之路受到过丰子恺的影响，黄源却更接近鲁迅。其他作家，如顾仲彝、朱生豪、曹未风等，各自在话剧创作、小说翻译等领域有不小的成就，互相之间的交集却很少，难有相近的文学品格。

4. 温州地区的作家与其他地区相对交往较少，而相互之间联系紧密，交往影响甚深。永嘉学派到清末民国初，出现了经学大师孙诒让，同时他又是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先驱者，使得浙南地区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初、中级教育。老一辈温州作家如夏承焘、王季思等人就在孙氏创办的新式学堂受教。更年轻的温州作家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为据点相互联接起来，受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纷纷参与了进步的文学活动。赵瑞蕙发起“野火读书会”，勾连起马骅、林斤澜、唐湜等一批30年代在十中念书的温州作家，以创刊《明天》为阵地，从事进步文艺创作。抗战爆发，他们又组织“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前哨剧团”，演出由董每戡、董辛民创作，董辛民导演的各种抗战宣传剧，对温州的抗日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宣传作用。温州现代作家虽然数量尚可观，但其成就与影响力与绍、宁、嘉三地比稍逊一筹。

5. 与以上四个地区相比，杭州虽为省会，经济文化发达，本土作家数量却并不算多，但举足轻重的不在少数。夏衍、郁达夫、戴望舒、施蛰存均可在各自的创作领域引领时代风气，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与其他杭州作家一起，将上

海作为重要的人生舞台，且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年代纷纷转向左倾，成为研究这一现象的典型性人物。

根据以上对五个浙江作家最集中地区的作家分布及走向分析，以1900年前后出生为界，我们可以把这些浙江作家大致分为五四时代和后五四时代作家。前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已经成名，如周氏兄弟、刘大白、蔡东藩、夏丏尊、胡愈之等，他们是传统教育方式下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家境殷实，诗书传承，很多人甚至参加过清廷的科考。他们的青少年时期还处于由近代向现代缓慢过度的阶段，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强大，脱颖而出的他们几乎都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学功底，因此，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入于新旧文化之间，既可以作倡导新文学的先锋，又不乏旧式文人的爱好和趣味，两者并行，他们得以建立起较为系统和强大的文学和学术自信。在社会形态和政治风潮剧烈的变化到来之际，涵养、经历和眼界已使得他们建立起完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文学和人生选择多样而复杂。

后五四时代青年作家1900年后出生，基本接受了完备的新式的初、中级教育，其经历与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叙述的大同小异：成长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浙江独立、五四学生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轮番上演，本人的经历则是新式启蒙初小、学徒、甲种工业学校、学运风潮、赴日留学、上海谋生中的诸种。30年代初国难愈加深重之时也是文学创作和人生选择的关键期，因此，他们在人生选择上要单一得多。除嘉兴地区外，其他四个地区的青年现代作家基本都选择了左翼文学的创作道路，而随着抗战的爆发，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或直接成为中共党员或参与到我党的进步文艺运动当中来，办报纸刊物，进行话剧、散文等进步文艺创作。

四、“后五四时代”作家走向与上海之关系

浙江作家生长于斯、受教于斯，其成名却大多在寓居他所之后。“他所”文化之异质性、氛围之包容性、人才之多样性，都促使作家们得以以“他者”之眼光，重新打量“自我”，从而实现文学和人生道路的转变或升华。上海作为毗邻浙江又是当时极为发达开放的国际大都市，无疑是大多数浙江作家的神往之地，最理想之“他所”。在109位浙江作家中，85人与上海有过交集。而在91位后五四时代作家中，32人在上海的中学、大学读过书，62人在上海谋生，48人在上海加入了左联或入党。因此，在他们的人生走向中，上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世纪初开始，上海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方面最西化的精英阶层诞生在这个城市，上海是时髦、华丽、最具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商业中心，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城市。另一方面新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中国最大数量的城市劳工也聚集在这个城市，从五四运动总罢工到各种反日运动、抗日战争，精英阶层、中产阶级和城市下层民众一次又一次联合起来，上海在政治上高度活跃。

上海高等教育机构的林立，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大学生群体，又为政治上活跃气氛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持。据学者叶文心对1934年高等教育机构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111所公立、省立、私立大学和公立私立的独立学院和特殊学院分布在21个省市，而上海独占25所，为全国之最。^⑧而“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设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非官方成果集中体现于上海，而上海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助于这方面的发展。”^⑨南洋、复旦和中国公学是20世纪最初十年里的三所代表性的私立大学，到20年代，大同大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又相继成立，私立大学相对灵活的办学方式和课程设计、低廉的学费、开明的学风，既延揽了一批海内外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入校任教，又网罗了大量激进的文学青年。其中最具有激进色彩的是上海大学。1922年上海大学成立，一大批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进入该校任教职。他们设计学校的课程，举办免费的公开讲座，吸引了大批爱国的文学青年入学，又进一步影响了学生的政治态度。这种影响在五卅运动期间达到顶峰，五卅运动正是产业工人与知识青年的爱国主义政治斗争的结合，而上海大学的浙江学生联合会在五卅运动中尤为突出，是当时上海工人运动中最为活跃的学生社团之一。

此外，租界相对独立、分而治之的市政管理体制给予民众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使得上海成为东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和中心。表现之一就是普罗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也被大量地译介，施蛰存就回忆说：“那时候，外国有了什么新

书都能进来。苏联进步文艺杂志在秘密书店里也可以买得到。我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和吸收基本上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同步的。”^①普罗文学虽不免简单、幼稚病，但其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仍然符合时代脉搏、符合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阅读期待。因此，“上海的出版机构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阅读倾向驱使，纷纷出版进步书刊。”^②三十年代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提到：“近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立此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③激进的左翼风潮在上海发展、壮大，至1933年“左联”的成立，上海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这些激进青年又转而成为左联的参与者乃至中坚力量。待左联解散，政治形势发生新的变化，由上海文化环境孕育和唤醒的这些浙江籍左翼作家或留在上海，或回到家乡，或辗转流徙到其他省份，而从事进步文艺创作已经成为其政治和文化使命，伴随其短暂或绵长的一生。

以上，我们探讨了后五四时代作家的走向与上海的关系。有论者认为，与传统教育相比，近代教育本身不以培养特定职业的人群为目的，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缓慢，无法吸收这些新受教育的群体，没有出路的学生被边缘化，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就很可能对原有的政治制度发起挑战。这时，近代教育客观上起到一种社会动员的作用。^④可以说，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在教育和文化资源上的近乎一枝独秀式的畸形发达，在“浙籍”现代作家尤其是后五四时代作家人生走向的趋同性、单一性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浙籍”现代作家与上海的关系给我们的启示不止于此。

古代社会，受教育是少数有闲阶级的特权，学术与文学往往是在门阀士族或者宦宦世家中代际相承，因此前人的成就尤其得到重视，学术的演进、文学的发展，多是一个体系内部缓慢、累积式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加上交通的不发达，作家的成长成才在一个相对固定、封闭的区域内可以实现。如李真瑜在《文学世家：一种特殊的文学家群体》一文中即指出，古代文学的繁荣和传承的重任，很大程度上是由区域性的文学世家来承担。^⑤近代社会尤其是20世纪开始，原有的学术范畴、知识体系已无法满足新的世界形势、时代氛围、社会环境之下渴求新知的国人的需求，知识的获取必须依靠信息的发达、交通的便利，通晓古今不再那么重要，沟通海外获取新知变得迫切。新式教育平民化普及和高等教育资源稀缺集中的特征使得大量受过初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涌入到经济发达，教育、文化优质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寻找自我实现的路径。可以说，近现代开始，作家的成长成才必须要走出原乡，待在原地就意味着故步自封。这一方面加快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地域特征在人员的大幅流动中逐渐淡化、模糊化，趋于同质化。狭义的文学地理学重点关注作家的地理分布及地域空间对作家创作以及作品中地理空间建构的影响，由此，“浙籍”作家这一标签在现代文学语境下还具有地理学意义，而在当代文化环境下，这一称谓更多意味着户籍制度下的人群归类，文学地理学研究需要在更宏阔的视野下创造新的生长点。

注释：

①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夏汉宁：《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④此概念见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一文，《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⑤陈坚：《浙江现代文学百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⑥郑绩：《浙江现代文坛点将录》，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

⑦周祝伟：《论浙江行政区雏形的历史形成》，《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

⑧浙江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页。

⑨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

⑩⑪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57页。

⑫施蛰存：《施蛰存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⑬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⑭鲁迅：《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55页。

⑮吴怡频在《新式教育读现代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影响——湖南、浙江两省比较》一文中，运用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观点，“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认为近代教育在经济、政治发展缓慢的近代中国，客观上起到一种社会动员的作用。

⑯李真瑜在《文学世家：一种特殊的文学家群体》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那些文化（也包括政治、经济等）含量较高的世家大族主要是在社会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特色之一。”《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